

日本败降经济原因初探

申 康 林

在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中,经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直接决定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日本也不能例外,其战败是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的;综合国力的相对低下是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原料、能源不足是日本战败的最直接的原因;动员形态和行政机制的不完备是日本战败的重要原因。如果说一、二两个因素是日本战败的硬件的话,那么第三个因素则是日本战败的软件。正由于日本经济在各个方面都不尽如人意,其最终的败局便不难理解了。

在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中,经济是第一位的。它既是战争的根本原因又是战争的基础。战争实际上是表现为“暴力”的经济较量。正如列宁所指出:“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斩钉截铁提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上也赶上先进国家”^①。毛泽东指出:“战争不仅是军事的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②。经济的这种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参战国为了能在这场规模庞大且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赢得胜利,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投入到战争中去。日本为了夺取海外资源供应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但同其称霸野心相比,其经济力量十分有限,从而注定了它的侵略迷梦必将破产。

一、综合国力的相对低下是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

与日本的国力相比,它所发动的战争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持久性上讲,都远远超出了其承受限度。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存在着明显的弱点:其一是工业化程度不高。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仍不足百年,工农业总产值之比仅为4:1,在9090万人口中仍有一半从事农业生产^③。其二是工业结构相对落后。长期以来,日本为了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重点发展投资少、见效快、劳动密集型的、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重工业从19世纪末刚刚起步,并且重点是发展以兵器工业为中心的产业。尽管到30年代中期,重工业产值超过轻工业,但就其总体水平来讲,仍不完善,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尤其是作为现代工业基础的钢铁业和石油业更显不足。1936年,日本主要工业部门的国际地位是:钢船第3位、钢块第6位、铸铁第7位、电力第6位、汽车第8位、石油第7位^④,不仅落后于英美法德等国,某些部门还落后于瑞典、挪威和加拿大。至于轻金属、化学合成等新兴工业,对日本来讲,则几乎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其三是严重依赖海外。日本是一个资源奇缺的岛国,国内市场不发达,从而使日本经济成为典型的加工贸易型经济。它的主要工业原料和燃料大部分、甚至全部依赖进口,主要粮食的10—20%也要进口^⑤,重要的设备、材料也有相当一部分依赖海外,1936年就有46%的工作机械是舶来品^⑥,进口汽车23000台,为国产汽车的4.6倍^⑦。

由于种种原因的制约,使日本经济具有不可克服的脆弱性,从而限制了综合国力提高,无法适应现代长期战争的要求。于是,日本统治集团便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出奇制胜,速战速决,幻想再取得一次日俄战争式的胜利,叫嚣3个月拿下中国,6个月击败美国。但是,事与愿违,战争反而向长期化、持久化方向发展。这样,日本国力的局限性便立即暴露出来,捉襟见肘,日见不支。

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日本却面临两线作战的考验。一方面在中国战场上遭到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陷于困境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在太平洋广大的海域上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展开了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空前规模的海空战。反法西斯盟国联合对日作战,无论人力、物力、财力上,都远远胜于日本。仅以美日对比,便可见双方力量对比之悬殊。1941年日美两国主要工业部门生产的比例是:煤炭1:9,石油1:528,铁矿石1:74,铕铁1:12,钢块1:12,主要物资生产的综合比例是1:78,综合国力之比为1:10^⑥。到1944年两国主要物资生产的比例拉大为1:18,国力之比达1:22^⑦。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日本的侵略举动只能是自取灭亡。

在两线作战的情况下,日本的国力日渐枯竭。战争期间,日本兵力动员最高达719万人^⑧,军费开支最高时达750.52亿日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以上^⑨,政府负债额最长达1776.96亿日元^⑩。国民经济实际上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应付庞大的战争需要,只有进一步压缩民需。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消费者支出所占的比例,由1940年的67%下降到1944年的38%^⑪。1941年—1945年,仅10大纺织公司被迫“直接经营”或“间接经营”的军工企业就多达50余家^⑫。为解决熟练工人的不足,大批学生、妇女、战俘被征召从事生产,战争期间仅征用10岁以上学生最多时就达300万人。由于粮食短缺,厚生省在1941年规定,从事一般工作的青年男子,每日热量摄入2400大卡,政府可以保证供应的食物。1942年,这一标准下降到2000大卡,1945年下降到1793大卡,远远低于人体需要的最低量2160大卡^⑬。尽管日本政府采取重点产业政策,保证船舶、飞机、轻金属、煤炭、钢铁等五大产业,但基础产业在1943年还是不可避免地剧烈下跌,兵器工业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也全面衰退。工业生产指数(以1935年—1937年为100)从1941年的169.1下降到1944年的86.1,农业生产指数(以1933年—1935年为100)从1941年的106.9下降到1944年的82.4^⑭。日本要继续战争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二、原料、能源不足是日本战时生产不振的最大制约力

“在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的条件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⑮日本是一个资源奇缺的岛国,它的主要工业原料、燃料大部分乃至全部都仰赖进口,这一点形成了日本经济的致命弱点。以1937年为例,日本主要工业资源的海外依存度是:石油82%,煤炭10%,铁矿石89%,铕铁10%,纸浆68%,糖88%,盐75%,铝矾土、菱镁矿、棉花、羊毛、生橡胶、磷矿石则是100%^⑯。仅从钢铁生产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日本在资源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性。1937年日本钢材生产为500万吨,其中铁矿石的84%、废铁的55%是进口的,炼钢用煤主要从华北输入。生产特殊钢,要从英国、加拿大、西里伯斯、新喀里多尼亚等地进口镍,从菲律宾进口铬,从印度输入锰,从中国、南美、泰国输入锑,从缅甸输入钴,从美国、秘鲁输入钨^⑰。这种状况在和平时期已足以使人忧心忡忡,而在战争时期,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首先,日本从海外输入能力下降和他国的经济封锁影响日本的资源输入。到中日战争时期,日本的外贸大体上是对日元集团(日本、满洲、台湾和朝鲜)出超,对第三国贸易每年都有巨额赤字。由于外汇不足,影响了重要战略物资的输入,如1937—1938年,铁矿石输入由431.3万吨下降到321.2万吨^⑱,原油输入由2033.1万桶下降到1840.4万桶^⑲。1938年的物资动员计划不得不削减二成^⑳。此后,尽管日本致力于“输出的振兴”,但输入规模一直未能超过1937年的水平。

此间,英美等国在日本的输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美国,成为日本石油、废钢铁等的主要供应者。但随着日本南进政策的确立,与英美的对立也日益尖锐化、明朗化。英美的对日政策逐渐由绥靖转为制裁。1939年7月,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条约,9月宣布禁止对日出口废钢铁。1941年6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对日实行经济制裁,8月对日全面禁运石油。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第三国贸易完全中断,通过正常贸易手段获取原料、燃料的途径完全被堵死。

其次,海上运输力量不足,限制了资源输入。日本的主要资源不仅依赖海外供给,还要经由漫长的海上运输线才能运抵本土,海上运输线的状况直接影响着资源的输入。因此,日本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商船队,并保证海上运输线的畅通。截止1937年,日本商船总注册吨位为447.5万吨,号称世界第三,仅次于英美,但也只能满足60%的海运要求,剩余的40%海运要依靠外国商船^㉑。

随着战争的扩大与升级,外国船只纷纷抽调回国,而战争又对海上运输提出更大的要求。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海运情况骤然吃紧,而盟国对日海上航线的袭击,更使海运每况愈下,进而制约了资源的输

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按日本的基于战场主动的设想,开战第一年船舶损失为80万吨,第二年为60万吨,第三年为70万吨^①,而实际上1941年12月—1942年12月就损失了104.2万吨^②。尤其是美国的对日无限制潜艇战,更是日本所始料不及的。战争期间,美国潜艇共击沉日本500吨以上的商船1113艘(另有65艘未核实是否击沉),共击沉日本商船总注册吨位为5320094吨^③。整个战争期间,日本商船共沉没861.7万吨,此外,尚有93.7万吨的船舶失去航运力^④。按企画院的推定,战争继续到第三年以后,日本需要船舶505万吨,扣除损失与新建的差额,日本将拥有525万吨的海运力。但实际上,1944年日本的商船总吨位只有210万吨,其中可供使用的又只有一半^⑤。到战争结束时,日本商船仅余70万吨了。因制海权的丧失,海上航线不稳,使商船的航行周期大大延长。如菲律宾航线的往返周期,1942年10月为28天,1943年3月为41.5天,1942年8—9月为70.5天^⑥。这样,有限的船舶在使用效率上又降低一半。

航运不足,大大影响了资源输入,成为原料、燃料短缺的关键所在。主要原料、燃料在1944年开始全面而大幅度的下降。如钢铁生产用原料就在1944年减少2/3。到1945年,日本船舶根本无力担负原料输入的任务。日本政府被迫采纳外务省建议:“放弃以铁矿石、煤炭、非铁金属为主的一贯方针,必须用最后的船舶最大限度地输入盐、谷物和大豆”^⑦,完全丧失了继续战争的信心。

再次,占领区工业水平的低下和占领区人民的抗战,制约了日本的资源掠夺。日本在战争期间曾占领7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广大占领区,清一色是农业国,自然资源绝大多数处于未开发的原始状态,因而日本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事资源开发。仅在中国占领区,日本就先后制定、实施了“满洲开发五年计划”、“华北生产力扩充计划”等一系列开发计划,以掠夺煤、铁等地下资源和棉花、谷物等农业资源。如华北生产力扩充计划就计划从1939—1941年将铁矿石产量由1410万吨提高到2930万吨^⑧。资源开发是项耗费时日的工程,加上力量不足,在开发过程中又大打折扣,所定目标始终未能达到。

另一方面,被占领国的人民顽强抵抗,也使日本对资源的掠夺难以如愿。如中国占领区,广大沦陷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壁清野、破坏设施、消极怠工等,都严重妨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计划,仅1940年8—12月,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就破坏了敌占区948公里铁路、3000余公里公路,车站、桥梁、隧道260余处^⑨。据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纪录:“昭和15年8月20日夜,(八路军)一齐对我交通线和生产地域(主要是矿山)实施突然袭击。……这次袭击是在我军完全没有预料的地方进行的,所以损失极大,需要很长时间和巨额经费才能恢复”^⑩,仅井陉煤矿的被毁,就使日军蒙受1亿日元的损失^⑪。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在日本战时经济运营的过程中,资源问题一直未能很好解决。例如,按日本钢铁生产的要求,每年至少要输入1000万吨铁矿石,但实际上最高年份也只有需要量的一半^⑫。这样,费尽周折提高的生产能力又因资源不足被大量闲置。如钢块生产能力从1937年的670万吨提高到1944年的1360万吨,增长了一倍多;而实际产量在1944年只有590万吨,仅增长10万吨^⑬。于是,出现了一方面开工率锐减,另一方面军需严重不足的矛盾。1941年钢铁生产的开工率是:钢材60%,钢块64%,铸铁73%,但同年却存在28.4万吨钢铁需求缺口^⑭。尤其是经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以后,这一情况变得更加严峻。日本的资源输入从1943年开始锐减,1940年—1944年,煤炭由701.1万吨下跌到263.5万吨,铁矿石由607.3万吨下降到213.5万吨,废钢铁由210万吨下降到2.1万吨,铅从10万吨下降到1.8万吨,橡胶从8.75万吨下降到3.15万吨^⑮。到1945年初,日本大部分工业部门停工待料,陷于瘫痪之中。日本已经被“原料”紧紧地卡住脖子,不战自溃。

三、经济动员形态和行政机制的不完备限制了日本有限经济力量的发挥

所谓国民经济总动员,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适应战争需要,由平时体制转入战时体制,以保障战争为中心,进行整个经济的改组,重点是急剧扩大军工生产,保障武装力量对作战物资、生活用品的需要。在战争的刺激下,国民经济在一定时期会有较快增长,但这种增长却为战争所消耗,不是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扩大再生产。因此,这种增长是虚假的,是破坏性地发挥经济的潜力。战争时间越长,战争对经济的破坏程度就越深。

日本在战时经济动员方面,有许多自相矛盾和混乱之处,从而制约了其经济力量的发挥。

首先,过久的战争动员使日本经济实力过早衰竭。日本所采取的动员形态,是类似于德国的临战或初战的动员补充型。早在1918年日本就颁布了“军需工业动员法”,从法律上肯定了战争动员。“九·一八”事变以后,

开始了经济的局部动员。中日战争爆发后,国会通过了“临时资金调整法”、“输出入品等临时措置法”和“‘军需工业动员法’适用法”,开始了对经济的全面动员。随后,一系列有关法律、法令纷纷出笼,并在1938年4月颁布了作为战争动员基本法的“国民总动员法”。这样,日本便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参战国中动员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家。这种动员形态,固然可以在战争初期先声夺人,但它也使经济潜力过早衰竭。因为,长期的国民经济军事化,国民经济难以协调、稳定地发展,而且过早的动员使生产能力在平时就达到了几近极限的高度,战时就难以有较大的增长。如194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398亿日元,1941年为403亿日元,1942年为406亿日元^⑤,连续三年徘徊,这在战争上升时期是少见的。以1940年国民生产总值指数为100,1944年日本指数是124,而采取临战或初战全面动员型美国的指数却高达165^⑥。两种不同的动员形态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由于日本采取了这种动员形态,使其经济潜力过早、过久地释放,而缺乏对潜力的培植。这种动员形态虽然可以在战争初期势如破竹、攻城掠地,但一旦战争呈现白热化的持久战趋势,便制约了经济力量的进一步提高。于是战场上的暂时优势便因缺少坚固的经济基础而转瞬即逝。

其次,日本的战争动员的规模、程度大大超过经济的承受限度。战争动员的规模和程度,是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前提的,它和战争的规模成正比,而和经济实力的大小成反比。相对于其侵略野心和所面临的战争要求,日本的经济力量显然是不足的,从而使其动员深度远远超出其承受力。1940、1942和1944年军事支出额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是17%、30.5%和50.9%^⑦,同期政府财政收入为39.8亿日元、52.6亿日元和82.4亿日元^⑧,而政府军费开支却高达57.23亿日元、187亿日元和750.52亿日元^⑨。

从动员的广义内涵讲,日本的动员形态又是一种片面的、破坏性的动员。日本统治集团虽然认识到“战时诸产业,首先是满足军需,其次与国民一般需求相适应”的必要^⑩。但在实际过程中,实行的却是压制非军需部门,全力保证军需要求的方针。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令,从各个方面限制与战争直接联系不大的部门,国民生活和非军需生产立即开始了持续且剧烈的下降。1944年日本的个人消费支出比1937年下降了39%,而同期德国也仅下降16.9%^⑪。从日本赖以立国的纺织业情况来看,1944年与1937年相比纺织机仅存30%,工人仅有26%,纺织物仅有17%^⑫。为解决军需生产不足,政府强令纺织业向军需生产领域“转向”,以保证所谓五大重点产业。这种片面过度的动员,作为权宜之计,的确可以破坏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与平衡,而且因基础部门的相对落后,进而制约了兵器的生产,导致军事上节节败退。

再次,日本的经济动员是非效率的。它的非效率性首先表现在其政策的混乱上。对战时经济动员的重要性,日本军国主义者早已认识到,但无论是中日战争,还是太平洋战争,日本都异想天开地认为将是一场短期战,因而缺少长期动员的思想准备,战时经济政策因此缺少系统性、全面性,而是被战局牵着走,对政策作被动的调整。只是到1943年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以后,才考虑提高全体生产水平的问题,但为时已晚。尽管日本战争动员比其他国家早得多,但动员的高峰却较其他国家晚。它的物力动员、财力动员的高峰是1943年,较苏联、德国为晚,而它的人力动员、军工生产的高峰直到1945年方才出现,在各国中是最晚的^⑬。

日本战争动员的非效率性还表现在各部门之间的权力争斗职责不明。日本战时经济活动一直缺少一元化的领导和计划,“中日事变爆发以后,历时五年,一直没有战时生产横的组织,……因此,命令屡屡重复”^⑭。商工省、农林省、铁道省、递信省在各自的领域各行其事。各部门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推诿责任。陆军省、海军省也直接掌握大量工厂,动辄以武力相要挟,干预其他部门。战时设立的企画院仅仅是作为内阁的咨询机构提出没有多大意义的“物资动员计划”,而没有执行权。部门间的职责不明,相互争斗,产生了不必要的拖延、浪费。这种斗争尤以陆海军之间的矛盾为突出,双方互不相让,以争高低。甚至陆军在战时也白手起家,搞起了技术要求很高的潜艇建造^⑮。陆海军为了飞机生产“经常发生纠纷,最终不能得出满意的结果”^⑯,据东条内阁1943年第二次行政调查,当时年飞机生产量为8000至10000架,而实际上每年生产53000架是可能的。由于双方的争斗,飞机厂分配的铝仅有55%用于飞机制造,剩余的45%大部分成为边角料^⑰。

为解决权力之争,1943年3月国会通过“战时行政特别法”,赋予首相以统管战时经济的大权,并在11月改组中央机构,成立军需省、农商省、运输通信省,分别对军需、民需和运输通信实行一元化的领导。但长期形成的矛盾并未因此消除。据1944年7月出任小矶国昭内阁军需大臣的藤原银次郎供认:“关于统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各大臣、尤其是陆海军大臣和我的意见尽管一致,但历来陆海军的竞争并未终止……要达到现实的统一是不可能的”^⑱。这种斗争使日本有限的经济力量也难以尽数发挥。正当陆海军为飞机生产争执不下的时候,

太平洋战场上,日军却由于航空力量不足,逐渐丧失制空权和制海权,进而导致整个战局的被动。

日本的战时经济动员,概括起来,从动员的时间看,它是参战各国中动员时间最长的,对经济的破坏也是最持久的;从动员程度上看,它远远超出了日本经济的承受限度;从动员内涵上讲,它是片面的;从动员的目的上讲,它只注重当前战争的需要,只能弥补当前供给的不足,而无法提供超出必需量的供给,它只追求经济的战争潜力的发挥,而忽视了对战争潜力养成;从效率上讲,它又是非效率的。这种动员方式,虽然可使日本横行一时,但也深深潜伏着经济崩溃的危机。一俟时机到来,便一发而不可收。

此外,盟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也值得一提,它是加速日本战时经济最后崩溃的因素之一,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自1944年6月,美军B-29轰炸机开始轰炸日本,从1945年3月—8月,又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轰炸,共向日本本土倾泻了161425吨炸弹,致使主要工业区化为废墟,160万户住宅被毁,一千数百万居民无家可归^①。但由于日本采取了疏散措施,轰炸对主要工业设备的破坏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主要工业部门相对于1941年的受损程度为:钢铁39%、煤炭2%、铝20%、工作机械18%、汽车30%^②。美军的轰炸,貌似残酷,实际不过是“打死老虎”而已。因为受原料不足的影响,“日本的军需生产在最初的战略轰炸之前……已处于绝望状态……日本在1944年第二季度已逼近灭亡的边缘。”^③美军的战略轰炸,是因为对日本实力判断不准,过高地估价了日本继续战争的能力。它的作用在于从精神上瓦解敌人斗志,“说服”日本认清败局。至于投掷原子弹,除开政治用心不提,对日本的投降来讲,更是画蛇添足的一举。

正因为以上种种因素的制约,它的投降从经济上讲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1944年7月出任总理大臣的小矶国昭在了解到经济实情后,不无感慨道:“认识到物的国力如此这般的衰退,悔不该自己担任总理”^④。1945年2月,近卫文相单独拜见天皇,在奏章的开头便开宗明义地指出:“战败固然遗憾,但必将到来。”^⑤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一旦它的最后挣扎被彻底粉碎后,便只能老老实实地在投降书上签字了。

注 释:

① 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第169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25页。

③④⑥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东京日本评论社1972年版,第32、23、23、179、149—151、181、211、27、30、29、149、151、67、71页。

⑤⑦⑩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山崎广明:《战时日本经济》,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版,第313、8、299、9、10、24、31—32、39、33、52页。

⑧ 木村隆俊:《日本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东京御茶水书房1983年版,第215页。

⑨⑩⑫ 山本弘文:《近代日本经济史》,东京有斐阁1980年版,第210、210、191页。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J. B. 柯赫:《战时战后日本经济》上卷,东京岩波书店1950年版,第29、80、129—170、153、154、158、185、185、14、105、105、106、106、113、82—83页。

⑩ 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东京有斐阁1985年版,第165页。

⑰ 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近现代》第3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7—208页。

⑱ 恩格斯:《马恩选集》第3卷,第211页。

㉖ 木田道太郎:《新讲昭和史》,京都启文社1985年版,第197页。

㉗ C. W. 尼米兹、E. B. 波特:《大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战史》,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第541页。

㉘㉙ 田中申:《日本战争经济秘史》,东京本书刊行会1974年版,第22、568页。

㉚㉛㉜ 张继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1—222页。

㉝ 吴景亭:《战争动员》,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页。

㉞ 相苏完:《昭和和经济史——战争与战时日本经济》,东京教育社1978年版,第141页。

㉟ 家永三郎:《日本史资料》上卷,东京法令出版社1983年版,第864页。